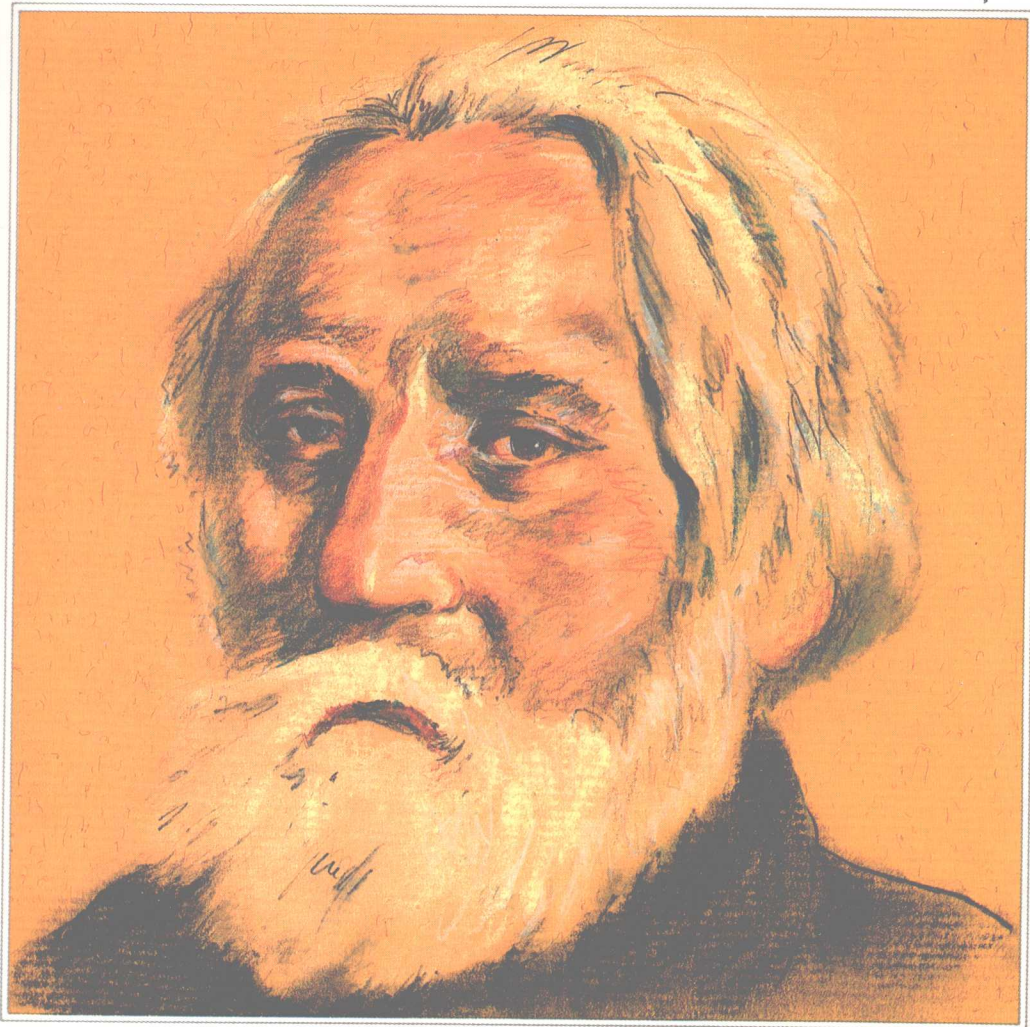


羅 亭

屠格涅夫(Ivan S. Turgenev, 1818~1883)爲十九世紀中葉，俄國社會中那群「言語的巨人，行動的侏儒」，塑造了一個真實深切的典型人物——羅亭。他容貌狂熱宛如黯夜裡最後一盞燈，但一面對真理他只是傳聲筒，面對生命也是絕對的輸家。



世界文學全集 ⑦

羅亭

屠格涅夫 / 著

書華

世界文學全集

LQ07

羅亭

發行人 / 林弘志
社 長 / 張坤山
主 編 / 黃慧隆
原 著 / 屠格涅夫
翻譯譯 / 邱素慧
管理部 / 邱瑞菊
發行部 / 蘇榮泉
出版者 / 書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臺北縣中和市中正路800號
電話：2231327~9
郵撥：0507053-1張陳秀梅帳戶
總經銷 / 學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店市民權路130巷6號
電話：9127307代表號
郵撥：0578690-5
印刷所 / 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
臺北縣中和市中正路800號
電話：2231327~9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局版台業字第2146號
初版中華民國75年元月

三版中華民國80年 7 月 定價80元

書華版權・翻印必究

致讀者

張坤山

——經營者的話

文學是人類文明中最珍貴和偉大的傳承之一。千百年來，文學創作已如天星、已似花海。雖然經歷了不計其數的戰亂與世代更迭，而文學仍始終矍鑠如昔，甚至因時代的流逝而累積得更豐碩，歷練得更晶瑩。

我從事印刷的工作，已有三十餘年。在這三十餘年中，自有許多無由宣說的艱難與辛苦。但是，每當聽到印刷機滾筒轉動的聲音，我就會彷彿受到音樂的感染一般，湧起一份不可思議的喜悅。作爲一個印刷人，忝爲文化界的小小先鋒，把最好的文學作品，以最精美的印刷和最合理的價格，呈獻給讀者，呈獻給社會，作爲對文化界的小小回饋，一直是我最大的心願。

經過長久的籌備，請益了許多出版前輩，雖然明知前景多艱，但爲了實現這份心願，我們毅然決然投下重金，禮聘數位國內知名的編輯及藝術工作者，爲我們整編並精製封面，以保護視力的二十五開本，有計劃、有風格地出版文學系列書籍，期望在我們爲出版史留下腳印的同時，也給廣泛的讀者和文學工作者，一個更爲遼闊的文學視野。願讀者和我們一樣珍視它，愛護它。

「本本皆好書，書書皆精華」就是書華堅持的經營理念，也是我們呈給書香社會的一點點心意。現在我以最誠摯的心情，把這個系列獻給我們的讀者和社會，並謙卑地等候批評和鞭策。

屠格涅夫與「羅亭」

他是全俄的沙皇，勢力強大，有不少步兵、哥薩克騎兵和大砲；他維持這麼一大片土地的政治統一，居功主偉；但是他還不會說話呢。他身上蘊含著偉大，却是啞啞的偉大。他沒有天才的聲音供全人類、各時代來聽取。他必須學著發言。到目前為止，牠還是一個啞啞的大怪物。但丁的聲音清晰可聞，他的大砲和哥薩克騎兵免不了鑄成一片虛空。有但丁存在的國家緊緊連結在一起，啞啞的俄國不可能比得上它。

一八四〇年卡萊爾說出上面一段話；屠格涅夫大概是一八五五年第一次讀到這段記載，當時他正在構思第一部長篇小說「羅亭」。卡萊爾提到的全俄沙皇——大帝尼古拉一世——在大英帝國、法國、土耳其聯軍包圍西巴斯托泊（蘇聯南部烏克蘭的軍港），向他的軍力挑戰時，不幸逝世。那年夏天，克里米亞戰爭達到高峯，失敗已迫在眉睫。評估的一刻來臨了。過去大家都斷言帝俄是歐洲的憲兵，政治上堅定的獨裁稜堡，現在大家已捨棄了那種觀念。改革的說法風行一時。俄國政府在亞歷山大二世的領導下，開始經歷信用危機，後來終於導致許多內在的改革，最

重要的就是一八六一年的農奴解放運動。同時俄國貴族——當代為止唯一受過教育的俄國社會階層——覺得他們正面對想法激進的年輕一代的挑戰。照社會學的說法，後者對公認的體制毫無虧欠，照意識形態的說法，他們隨時準備以革命前途的名義，否決一切權威。這表示貴族知識份子——屠格涅夫和老一代的人都屬於這一類——正面對一羣激進的知識份子，後者對農奴制度沒有既得的利益可言，也看不起老一代所推崇的自由主義，以及最神聖的藝術和個人人格的觀念。

嚴格說來，俄國沒有但丁，這話一點也不假；而且它雖有獨裁政治的權威，却是一個充滿嚴重經濟和社會問題的國家，就連一八四〇年也不例外。但是卡萊爾說俄國沒有聲音，却完全說錯了。俄國正以普希金的聲音來學習發言，只是它大部分只說給自己聽罷了。到了一八五五年，也就是普希金死後十八年，戈果里死後三年，在外面世界看來，俄國還顯得啞啞無聲。由於審查制度，俄國對內也不能暢所欲言。第一代俄國知識份子最清晰的發言人亞歷山大·荷森已經在一八四六年離開俄國，自願放逐到西方世界，尤其是倫敦。他在該地發行「鐘聲」雜誌，變成一八五〇年代最有影響力的俄國出版家。俄國內部最重要的新觀念論壇是「當代」雜誌，一八三六年由普希金創刊，屠格涅夫的重要作品都寄往該處，尤其他描寫農民生活的成名作^①最為重要。到了一八五五年，「當代」雜誌的編輯方針頗受一位激進派新人Z.G. 契尼許夫斯基的唯物觀所影響。雖然這份刊物由屠格涅夫這一輩的尼卡拉索夫和巴奈夫主編，此人却想把它轉變成當代激進人

士最大的機關刊物。於是他設法疏遠屠格涅夫和許多與他類似的人。不過屠格涅夫對當代的趨勢一向很敏感，比同時的人更有先見之明，他在一八五五年就知道社會政治氣氛正在改變，新的呼聲正普受重視，新觀念也即將出籠。他還察覺出，現在應該重新估計知識份子在俄國社會中的角色了。身為小說家，他要變成知識份子的記錄者和批評者；也要捍衛知識份子在俄國生活中的一個角色：就是散佈有益於俄國社會，對未來福利必不可少的觀念。他要在「羅亭」一書中表明，俄國藉著老一代的知識份子，正開始獲致一種心聲——就是所謂「四十年代人物」的心聲，所指的即是卡萊爾把俄國描寫成嗜啞大怪物的十年間，像屠格涅夫這樣已達成成熟階段的人物。

大家研究屠格涅夫的劇本「鄉間一月」中的拉吉亭，「狂人日記」中的朱卡杜森，「希葛羅斯基地區的哈姆雷特」中的無名哈姆雷特，對於他作品中的「多餘人物」早已非常熟悉。若斷言他第一部長篇小說中的羅亭是這種「多餘人物」進一步或者最終的發展，未免是陳腔爛調的批評。「多餘人物」的多餘性主要得用社會名辭來解釋，他往往是一個真有才華的人，在當代社會中找不到自己的容身之地。屠格涅夫想用文件證明和剖白這種人物在俄國社會中存在的事實；強調「多餘人物」的悲劇性情況和喜劇性缺失。我們在羅亭身上輕易發覺的弱點無疑起自早期的攻讀——頭腦和心靈分開，對生活問題是用理性思考之不當，哈姆雷特型的內省和猶疑，起先盲目自信，很快就化為被虐性的自貶，還有暴露狂的自剖需要。但是羅亭雖表現出「多餘人物」的弱點

，屠格涅夫却精心將他刻劃成遠超過這些弱點的人物。從實用觀點來說，他也許是失敗者，但是他和前面的人物不同，具有某些英雄的特色，小心翼翼溶入他的性格中，清晰強調出他對社會的關切。

一八五〇年代早期，屠格涅夫曾經想要寫一本名叫「兩代」的大部頭小說。到了一八五五年，計劃仍停留在初期階段，他似乎捨棄了這個念頭，打算寫我們熟知的這一部處女小說作品。「羅亭」的概念在一八五五年六月間形成，也許就在他的三位密友波特金、葛里哥羅維治、杜魯金寧到他的史巴斯克伊莊園小住期間，或者他們離開後不久。朋友們和他共度三週，大部分時間都從事業餘戲劇的演出。他們製作一齣「款待學校」，演出非常成功。這齣戲完全沒有契柯夫之前的風格，不像他唯一的長篇劇作「鄉間一月」（成於一八五〇年。被審查官禁演，二十餘年後才公開演出），但是至少使屠格涅夫想到戲劇演出，尤其是對話的問題。讀者懷疑，「羅亭」那明顯的戲劇形式就是這個經驗造成的——全書讀起來大部分像劇本，尤其是列茲堯夫、服玲薩夫和亞歷克山德拉·李蘋之間的幾個場面——而且特意強調一場接一場的事件陳述方式。

他的朋友們造訪吉巴斯克伊莊園，更重大的影響就是當時 V.P. 波特金對湯瑪士·卡萊爾的作品發生了興趣。波特金是屠格涅夫的文學顧問之一；由屠格涅夫一八五五年六月十七日寫給他的信看來，是他勸屠格涅夫撰寫「羅亭」這部作品的。毫無疑問波特金也把本文開頭的那一段卡

萊爾名言拿給他看了，該段名言宣稱俄國沒有「天才的聲音。」（對了，一八五六年初波特金在「當代」雜誌發表卡萊爾作品的譯文，這一段並未刊登。「羅亭」的第一部分就刊在這一期上）我們可以斷言，屠格涅夫和波特金一定討論過卡萊爾「英雄與英雄崇拜」所挑起的一些觀念，也許那些觀念對屠格涅夫有催化作用，使他注意到「羅亭」這一型的人物。

卡萊爾承認，當代批評家嘲笑人們對偉人的景仰，這是很普通的現象：「讓批評家看看一個偉人……他們開始所謂的『估量』他；不崇拜他，却測量他的尺寸——使他變成一個小號的人物！」屠格涅夫刻劃羅亭，可以看出這種過程。但是卡萊爾想恢復大家心靈中的英雄理想，因此他儘量闡析一個人身上造成英雄比例的特質。其中最重要的是一個人的信仰，也就是卡萊爾說的：「……一個人實際相信的東西……一個人實際上銘刻在心、肯定知道的東西，他關切自己和神秘宇宙的重要關係，自己在宇宙的責任和命運，無論如何這便是他最基本的一切，其它的事物都決定於此。那就是他的『信仰』……」屠格涅夫一定馬上就瞭解這些話：當然不是指教堂的信仰，而是身為人類最高貴的信念。羅亭在小說裏一出現，就斷言人類有這種信念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才能反駁和應付地方上假智者畢加梭夫的懷疑主義。羅亭滔滔訴說他的信念，一開始就獲得喝采。隨着小說的推進，他的話愈來愈像實弄辭藻，但是他從未失去流利的辯才。這種辯才正是卡萊爾所褒獎的英雄特徵，因為這種人能洞悉並表達事物的可愛，大家都叫他們「詩人，畫家，可

愛的天才」；卡萊爾追溯這種英雄的起源，一直推到「創造詩歌；人類語言的音樂和它奇妙的北歐風格」的諾斯·奧亨和羅內斯（羅內斯十奧亨＝羅亨，這個是挺不錯的想法）。羅亨講了一個「北歐」奇譚②，結束了他第一個成功的夜晚，也同樣為他的雄辯詩才而備受誇讚。——達爾雅·拉蘇斯基承認：「你是詩人」——我們獲知羅亨擁有「至高的奧秘——辯才的音樂。」換句話說，屠格涅夫賦與他的主角某些卡萊爾想要闡析的英雄特質，當然我們若引證說卡萊爾的文章和屠格涅夫的刻劃有什麼特殊的關係，未免達於牽強。屠格涅夫直到一八五七年才見到卡萊爾本人。他從來不像契西·沙吉那麼自然地醉心於英雄崇拜，但是他想讓羅亨比他以前筆下的「多餘人物」多一點「英雄」特質，這是非常明顯的。

還有一點也非常明顯：他打算讓這幅肖像帶一點批評意味。六月十七日他寫給波特金的信裏堅持說：「有些時代，文學不能只是藝術——有些興趣比詩的興趣還要高超，自覺和批判的契機在民族生命的發展中就像個人生命中一樣必要……」羅亨的肖像具有批評意味，就在於它能塑造或毀掉他自己身為作家的盛名。如果刻劃失敗了，他打算永遠放棄寫作；但是他很喜歡那種間歇性的絕望。這幅肖像有批評意味，還在於它是一種自我檢視的行為。時當一八五五年六月和七月，霍亂病爆發，他被迫留在史巴斯克伊莊園，不能照自己的意思去打松鷄。這時候他迅速寫好這部小說的第一份草稿。不過這本書當然也是對同一代俄國知識份子的批評。藉着檢核他這一代的

缺點，他想闡析未來俄國知識份子的真角色。不過，就在這個時候，他第一次接觸到激進派出版家契尼許夫斯基的唯物觀點——刊在他的美學論文「藝術對現實的美學關係」中。這時候他在書信中坦白批評契尼許夫斯基，七月二十五日又在一封給波特金和尼卡拉索夫的信函中闡述他的敵對觀點：「說到契尼許夫斯基的作品，我反對的主要原因如下：照他的說法，他覺得藝術只是現實和生命的一種代用品——事實上只對不成熟的人有益。無論你怎麼看它，這個觀念變成他一切言論的基礎。但是我認為這是一派胡言。事實上沒有人會像莎士比亞筆下的哈姆雷特——就算有，也是莎士比亞發現以後，再把他化為人人能接受的典型。」契尼許夫基認為藝術只是一種生命的附件，作家永遠不能創造出新的東西，更不要說像莎士比亞創造哈姆雷特一樣創造出宇宙性的人了，契氏的看法就數這一點最讓屠格涅夫傷心。這種藝術觀即使不曾誤解他在羅亭身上創造的一種相當世故的典型——哈姆雷特和唐吉訶德的混合體、辯才智識和冷靜心靈的混合體——至少很可能對它做了錯誤的解析。

因此他對中心肖像的瞭解是有根據的。屠格涅夫有意批評和檢討那一代普遍存在的俄國知識份子的典型。不過屠格涅夫也承認，它是照某幾個特殊的人物塑造的，尤其是他以前的朋友兼智識導師米克海爾·巴庫寧。巴庫寧一向擁有辯才，加上深厚的哲學興趣，不過一八四〇年代早期屠格涅夫在柏林以學生身份認識他的時候，他深受德國理想主義的吸引，到了一八五〇年代興趣

却轉向無政府主義。屠格涅夫還借重他以前這位朋友的其它特質——他支配別人、干預隱私、向人借錢的癖性，也許還借重了他的無能——來刻劃羅亨這個角色。十月他離開史巴斯克伊莊園，前往莫斯科，隨身帶了這部小說的草稿，其中就包含這一切的要素；他到達莫斯科，剛好趕上當代最受敬愛的葛蘭諾夫斯基教授的喪禮。喪禮第二天，他寫了一篇訃文，附了如下溫暖的頌讚：

他不費弄學問，充滿迷人的體貼，甚至當時③就能夠激起日後許多人所經歷的敬仰心情。他身上散發一種高貴純粹的影響力；他天生（這是一種罕見的幸福天賦）能夠喚醒別人心靈中的美感，不是透過信念的表達，不是憑辯論，而是憑他自己的靈性美；他是最高尚的理想家，不是孤立的理想主義者。他有權利的表達，我對人際的東西都不覺得格格不入，因此人際的東西對他也不覺得疏遠。幾年後我在柏林遇見他。當時我幾乎看不出他身上有什麼特性——我們沒有繼續交往……說實話，當時我還不配和他來往。何況他當時和N V史坦克維治過從甚密，此人不是三言兩語所能道盡，此時此地却又不宜多說。史坦克維治對葛蘭諾夫斯基頗有影響，他一部份的靈性已進入他心中。

葛蘭諾夫斯基的逝世使得屠格涅夫重新斟酌羅亨的肖像。我們可以猜到，他決心強調羅亨所宣佈的理想主義和愛美心，以對抗契尼許夫斯基的唯物觀和功利主義，但是他一定同樣關心這幅畫像和巴庫寧的相似點，他覺得頗不恰當，所以想加以掩飾，同時說明鼓舞他這一代青年生涯的

觀念是多麼富於利他主義和理想主義的色彩。因爲一八五五年秋天，巴庫寧由奧國政府交給俄國當局，入獄監禁，他不得不稍微掩飾這個角色和巴庫寧相像的地方。鑑於這一點，屠格涅夫初抵彼得堡時，凡是聽他唸小說草稿的人都覺得需要修改一番。羅亭的肖像變得更寬廣、更深刻，至少縮減了他性格中卑劣的一面，因此屠格涅夫在現在的第六章加入列茲堯夫的長篇大論，描述他在波珂爾斯基圈子裏以學生身份和羅亭相處的經驗。羅亭和波珂爾斯基的對比，很多評論家都認爲是指屠格涅夫對巴庫寧和史坦克維治看法的差異——一位是年輕的雄辯家，他的口才可以涵蓋一切既成意見的領域；一位是有創意的天才，雖然表面上不那麼壯觀，却能在最野蠻的人身上激起高貴的情操，「彷彿你在一間又髒又暗的房間裏打開一瓶久經遺忘的香水瓶似的。」

另外一項大改變就是加添了列茲堯夫最後一次遇見羅亭，修改以往嚴苛判斷的收場文。這部小說首度發表後四年——一八六〇年——屠格涅夫又加上一八四八年羅亭死在巴黎防禦上的最後一個鏡頭。這一場戲的歷史資料太專門了，難免分散小說年代上的整體性。我們不得不斷言，屠格涅夫有意把小說的主戲安排在一八四〇年代中期的某一點，而羅亭和列茲堯夫首次見面則發生在前十年的中段（換句話說，就在屠格涅夫自己的大學時代），所以小說一開始，羅亭和列茲堯夫分別是三十五歲和三十歲。因此，他們可以說是屬於「四十年代的人」。一八五六年，這部小說首次發表於「當代」雜誌，分成上下兩部，但是後來的版本都不採用這種分法。本書的第一部

法文譯本由屠格涅夫本人和路易·瓦多——亦即寶琳·瓦多之夫——共同譯成，在一八六二年發表，章節重新編過，內容也小有更改，最有趣的就是把列茲堯夫責備羅亭缺乏「男子氣概」的話擴大成「此人所缺者，乃意志，乃勇氣，乃力量」④除了小處更動以外，終其一生屠格涅夫這本小說都維持一八六〇年的形式，連娜泰雅對羅亭的祖父姓名不敢確定，也保留不改：通常她叫他狄米屈·尼古拉克，但是在重大的時刻（例如第七章）他又變成狄米屈·尼哥拉伊奇了。

這本小說經過改寫和加添，顯然是要把中心人物的某些細節弄得模糊一點，不過儘管肖像的邊緣稍稍模糊和褪色，也許就像老照片隨着年代而發黃一般，但是它仍然有着清晰、生動的輪廓。屠格涅夫成功地把握了一幅活生生的形象，栩栩如生，其秘訣必須在他這個人固有的興趣中去尋找。大衛·西西爾爵士曾為阿利克·布朗（一九五〇年）的早期好譯本寫了一篇介紹文，說屠格涅夫的：

人性肖像力求忠於事實：不過他還來刻劃的事實都非常有趣。他筆下的男主角和女主角真是本性善良、情感深刻、腦袋好奇、風情優雅的文明人。他只真切地描寫他們，便能產生怡人的作品。有人問過，我們為什麼要浪費寶貴的時間，閱讀實際生活中我們辛辛苦苦逃避的那種人的故事呢？讀了屠格涅夫的小說，誰都不會提出這個問題。

我們知道羅亨這種人多麼受不了，在現實生活中一定會敬而遠之。當然我們很可能會接受他對人生真相的見解，一種理想或目標的閃光，那些東西就像閃電，能夠照亮世俗的生活，給人生一點安慰。

屠格涅夫老是宣稱，他看見書中的人，彷彿心靈的眼睛所生出的肖像似的。在一本回憶錄中，據說他曾經說過：

我大抵被一幅肖像所追逐，要很久才能抓住它。奇怪的是，我往往先想出次要人物的清晰形像，最後才想起主角。例如在「羅亨」一書中，我腦中最先出現畢加梭夫的清晰形像，揣摩他如何開始和羅亨辯論，羅亨如何反駁他，然後我眼前才生出羅亨的肖像。

這份告白頗有價值。信者和疑者的對比，真概念狂和尖刻忿滿的犬儒派之間的對比，最能讓人心服。它可以輕易變成一本小說的胚芽概念，以戲劇方式構思，當做真實性格描寫的媒介。就我們現在所知，這本小說和中心人像的效果完全依賴佈景——一個虛構地方——的制定，主角由廣大的外界以陌生人身份來到這兒，提出了相反的觀念和態度，深深吸引住女主角娜泰雅，隨着他們關係的演進，我們再透過她來發現男主角的弱點。佈景的安排很不錯，一方面經由亞歷克山得拉·李蘋訪問農家病婦的描寫，一方面經由達爾雅·拉蘇斯基鄉村大樓的刻劃。生活在這個小

世界的人——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列茲堯夫、柏達列夫斯基、服玲薩夫、巴西斯它夫、彭果小姐、畢加梭夫、最後是達爾雅·拉蘇斯基本人和她的女兒娜泰雅——優美地躍入生命中，和佈景相配，像舞台上的戲角一樣生動，習慣於舞台的風格，不過有一點和舞台不一樣，他們是各個角色的男主人和女主人。「好」人好得有趣：亞歷克山得拉·李蘋，她的兄弟服玲薩夫，她的仰慕者列茲堯夫，他們具有鄉下大地主那種自然、缺乏想像力、一本正經的善良品格。在英國佈景中，這種人也不難想像。架子十足的「大貴婦」達爾雅·拉蘇斯基雖然不像設計出來的人物，却顯得很像外國人，而她的馬屁書記官柏達列夫斯基倒是一幅絕佳的諷刺畫像。忿懣機智、討厭女人的畢加梭夫是一個真正迷人的角色，他在這片狹窄勢利的鄉村世界中可以獲得「性格」的名聲。文中虛構的地方和裏面的居民都很單純、易辨，具有真實感；但是外來的主角超越了他們有限的現實：他們各自隱入虛構的聖龕以後，他還在腦海中永不磨滅。

羅亨個子高高的，風采甚佳，能說會道，具有辯才，很能激勵人心。我們注意到，他的衣服不是新的，而且顯得有點緊，他的雙手又大又紅，但是目光炯炯，而且很會說話！他是理想主義者，雖然他的理想難免模糊不清，而且傾向未來，他却能使那些理想顯得很迷人，值得犧牲一輩子去達到。列茲堯夫在最後的辯白中說：「他有熱誠；請相信我——因為我是以冷淡人物的身份來發言——那一點正是我們這個時代最珍貴的特質。我們都已經理智、淡漠、衰頹得叫人難以忍

受；我們睡着了，我們僵冷了，若有人喚醒我們，暖化我們，就算只是片刻，我們也應該感激他！」那一個初夏的傍晚，羅亭確實喚醒了達爾雅·拉蘇斯基家裏聚會的一羣人。就算有一點天真吧，羅亭表明觀念信仰的重要，很快就反客為主，壓倒了畢加梭夫，他又強調人類必須信仰科學和知識，因為人類必須對自己和自己的能力具有信心。他辯論說，一個人若沒有堅定的主張，他怎麼能認識同胞的需要、旨趣和前途呢？這段問話掀起了俄國知識份子獻身國家未來福祉的整個問題，羅亭滔滔不絕地說，這項任務需要拋棄自我，追求更高的目標。他的話具有宗教吸引力，因為他活像宗教的高僧大談信徒對人類、對國家的服務，大談人民的解救，他可以憑概念清清楚楚楚激起聽眾的心靈。羅亭不是江湖郎中。但是他在達爾雅·拉蘇斯基家的第一個勝利之夜，臨別說了一個北歐半島的奇譚，他承認全人類的努力都是曇花一現，人類註定要像黑夜飛入光明、又飛回黑暗的鳥兒，過着飛逝而無意義的一生，而他羅亭也和下面一個人一樣，命運早就註定了。

這一次勝利以後，其它方面滿盤皆輸。屠格涅夫輕輕鬆鬆叫讀者注意他的幾個癖性：他慣於對自己過去和生命角色有關的問題顯出驚奇的样子，他喜歡重複問題再提出答案，他說故事比較不成功，他缺乏幽默感，雖然他能做一名好聽眾，他的應對却有弱點。在他和娜泰雅的關係中，我們看出他的言語受到挑戰，而她憑着全然的坦率 and 無敵的天真，可以看出他這一套缺乏目標，却仍不免被他的學識——尤其是德國文學和思想方面的知識——深深吸引。他承認到目前為止，